

# 我怎樣遇見王默人

我認為王默人的小說（文學）在剛起步時候做出的選擇，不但成為他一生文學路的單行道，也影響他自己一生的命運。當他選擇了這條路時，就沒有迴轉、掉頭的空間。他選擇的文學路是真實、誠實的「現實」，他選擇活在現實中的衆生。

◆彭瑞金 靜宜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 拒絕從邊緣發聲

我的台灣文學史觀在初發的階段，就由我的文學師傅葉石濤，為我注入「本土主義」的疫苗。我似乎從未質疑過他在〈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中、開宗明義所主張的，台灣的鄉土文學指的是「本省籍作家及其作品」。我還記得葉老給我的私房忠告是，外省人的事非常複雜，誰也理不清他們背後錯綜複雜的關係，千萬不要去碰他們的東西。葉老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我當然能夠理解，葉老說這些話時，剛剛度過了15年以上的苦難歲月，在60年代以驚弓之鳥，走出白色恐怖的陰暗，非常不容易地重拾他的文學彩筆，需要比別人加好幾倍的小心在文壇行走。

其實，葉老並不失文學人的天真，他還是有很多外省人文友，朱沉冬、李冰、朱西甯、張放、何欣、徐秉鉞、蔡文甫……不勝枚舉的外省作家和他都有一定的交情，他最後定稿的《台灣文學史綱》也不分省外省內作家一律納入「台灣文學」。不過，葉老的忠告還是對我的文學史觀帶來一定的影響。1980年代末，我受自立晚報出版社委託撰寫戰後40年的台灣文

學史時，我便明白拒絕以「鄉土文學」從邊緣發聲，我明確地從文學運動的觀點，強調了台灣在台灣文學裡的主體性。不問別人是否把這視為個人對台灣文學史的偏見，我從1982年發表〈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以來，這已經成為我個人沒有妥協的台灣史觀。因此，從我的史觀看出去，主導、佔領、巨量的50年代，甚至整個60年的戰鬥文藝、反共文學、省外來台作家的鄉愁文學、留學生文學等文壇主流，都不免被我寫的文學史邊緣化了。

我是首先邂逅《阿蓮回到峽谷溪》才「認識」王默人。其實我在讀到那本小說集時，根本沒有思考作者的身分背景，只是從作品中找到了我肯定的文學元素。很多年後，擔任陳建忠教授指導的研究生李勝吉的論文口考委員，才在他的論文中驚訝地發現：「由於王默人在寫作上固執於自己所真正要寫的，而從不為外在的任何因素所動搖，做事的態度也同樣的認真而不循私苟且、逢迎媚俗，因此與現實環境格格不入，甚至被當局的情治單位盯上，最後走投無路，只好在1985年遠走異鄉。」原來王默人不在文壇的「主流」，他的作品中那種不被主流認可卻拒絕以邊緣發聲的堅定，才是他

的作品深深吸引我的原因。60年代葉老復出文壇的第一時間就立誓要寫一部台灣的鄉土文學文學史，他發言的時空背景，台灣文學也是不被文壇主流認可，他也是不選在邊緣發聲。

《文學界》創作之初，我主張的台灣文學本土化，同樣也是有被邊緣的自覺下，拒絕從邊緣發聲。讀過李勝吉的論文，也才豁然開解王默人作品中「異質」的由來。

戰後來台的新住民作家，並不是全面有意的拒絕「本土化」，大部分人有太多的過去要寫，有自己的家鄉要寫，來到台灣之後的生活圈也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除了和日常生活有緊密關係的三輪車伕、工友、司機、下女、酒女、市場小販，很少人有機會上山下海和農民、漁民、礦工「生活」在一起，所以要他們寫出葉老所說的，在精神層面和心理層面上和所謂的下層勞動階級「同樣共通經驗的人所寫的作品」，會有實際的難度。有人說，1950年代台北女作家間出現過所謂的「下女文學」。按照葉老的台灣文學台灣意識論，當然不屬於核心的台灣經驗文學。

### 王默人堅持的文學創作觀

王默人的小說似乎是打定主義不揀軟柿子吃，刻意挑戰這種難度。當然，最原始的挑戰動力還在他有自己堅持的文學創作觀，他在接受李勝吉隔洋訪問時說，他的作品追求寫實。

這種「寫實」的寫作態度，恐怕也包括他所從事的新聞工作上的寫作，譬如讓他耿耿於懷數十年的，他寫的新聞讓情治單位認為有問題，被約談，遭到搜索，終而「被迫」離開住了三十多年的台灣。不過，他在小說（文學）創作和新聞寫作之間，似乎有自己劃定的限界，他的小說中描寫的人物、事件，無論怎麼看都很平實，看不出有什麼逾越，還是情治單位另具「慧眼」？

以王默人在台灣出版的短篇集而言，無論是早期寫和他同樣背景、身世相近的，離鄉背井流亡來台的商人、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還是後來寫的農民、勞工，充其量只是不扭曲、不誇飾的不失真而已。以王默人在台寫作的、主要的50、60、70年代，如果作家想要真誠、真實面對自己生活的現實世界，無論台北還是台北以外的邊陲，能受到「高層」照拂的畢竟非常少數，多數的人不分行業、不分新舊、本土，都需要不算輕鬆的奮鬥、掙扎，才不致被時代淹沒，才能不在生存的道路上仆倒。只要是能本諸良知寫作，不願成為說謊共犯的誠實的作家，甚至新聞工作者，寫出貼切事實、人間真相的作品，無疑是作家的天職所在。不容否認，有些寫作者受到客觀生活條件的圈限，看不到足夠寬廣的現實，作品反映的真實有限。和王默人相同時代、背景的寫作者，往往就是受到軍、公、教，甚至是國營、

## 第五章「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

## 台灣文學史綱

集《山洪爆發的時候》。五〇年代曾有「野馬傳」出版，可惜，這部長篇小說在台灣難得一見。

王默人，本名王安泰，一九三五年生，湖北黃梅人。五〇年代已出版短篇小說集《孤兒淚》。一九六八年再出版《留不住的腳步》。進了七〇年代有《周金木的喜劇》、《八〇年代有「阿連回到峽谷」》等短篇小說集。王默人是持現實主義觀點的作家，其根於台灣下層社會，描寫形形色色的窮苦人民，其挖掘的筆觸銳利而無情，充分表現出階級受壓迫的受害和苦悶。

蔡文甫，一九二六年生，江蘇鹽城人。他從五〇年代開始出版小說集，但六〇年代、七〇年代作品較多。六〇年代有《沒有觀眾的舞台》、《女生宿舍》、《雨後的月亮》，七〇年代有《玲瓏的畫像》、《舞會》、《變調的喇叭》等。作品風格多吸收西方現代小說手法，不重語言文虛和詭奇，描寫小人生活中的眾多挫折、無奈和空虛。

楊青矗和王拓也開始發表小說，但他們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七〇年代刊行。白萩，本名何錦棠，一九三七年生，台中市人。六〇年代有詩集《風的蕭瑟》、《天空象徵》。後又出版《香頰》（一九七〇）、《詩廣場》（一九八四）。白萩的詩富獨創性，語言鮮活，是一位敏銳的詩人。

陳千武，本名陳武雄，另一名筆名超夫，一九三二年生於台灣南投縣。日據時期即有詩作發表，光復後曾停筆十幾年。六〇年代著有詩集：《密林詩抄》、《不眠的眠》、《野鹿》。另有《媽祖的礁足》（一九七四）、《割伊詩稿》（一九七四）、《安全島》（一九八二），及小說集《獵女記》。對民進黨、轉鄉邦的詩交流有極大的貢獻。他的詩充滿強烈的歷史感和現實意義。

杜國清，一九四一年生於台灣省臺南縣。大學時代曾加入「現代文學」，對於艾略特、西脇順三郎、波德萊爾等詩人的介紹，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杜國清具有浪漫的資質，使他對感性世界的追求從不間斷。六〇年代有詩集《蛙鳴集》、《島與海》出版。七〇年代後出版《強朗》（一九七〇）、《伊影集》（一九七四）、《望月》（一九七八）、《心靈集》（一九八三）。趙天儀，筆名柳文哲，一九三五年生，台灣台中市人。一九四四年因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迫離開台大。曾出版詩集《果園的邊沿》（一九六〇）、《天安侯爵》（一九六五）、《搖籃房》（一九七八）及有關美學論述、詩評論。趙天儀的詩機密而不造作，注重日常性，因而語言有時顯得過於明朗。從抒情的寫實到批判的寫實，是他的詩展的軌跡。

李魁賢，曾用過筆名楓堤，一九三七年生，台北縣人。六〇年代有詩集《獵骨塔及其他》、《枇杷樹》、《南港詩抄》出版；另有《赤溪的蕭瑟》（一九七〇）、《魁賢詩選》（一九八五），及評論、翻譯多種。對於里爾克及德國詩的介紹，國內無出其右者。李魁賢的詩具有敏銳的感性，同時能秉持詩人特有的立場與方法，將外界現實投射於內部世界。

- 一九七六年一月《明報月刊》，由先勇周兆祥譯《流浪的中國人——台灣小說的歷史主題》。
- 以下作家介紹多節錄出版刊行《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短篇小說選。
- 一九八四年七月《文訊月刊》，齊邦媛《江河匯集處：六十年代小說》，第五十七頁。

• 125 •

• 124 •

1987年出版的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在〈60年代的台灣文學〉篇章將王默人視為「持現實主義觀點的作家」。

黨營事業機構的職業圈限，能知能看的不多，能說的也就更少了。王默人所以成為新住民作家群中的「異類」，和他從事號稱自由業的新聞工作或有關係。不過，在戒嚴時期，新聞工作也不是沒有圈限的，他的被迫離開，就是證明。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王默人在台三十多年寫作有其堅持，也有其轉變，他在戰後新住民作家間的「異」並非突來其異。王默人開始寫作的1950年代，作品大都以描寫來台的新住民族群中的「中下階層」。從當時的文學現實看，就是重大的文學良知的抉擇，表示他不選擇走「反共文學」的主流大道——有園地發表、有獎金可拿、有功勞簿（獎）可記，是一路好走

的寫作坦途。他卻選擇了另一條有功無賞、打破要賠的險路。他要寫的是新住民族群中面對戰亂苦難，在生活洪流中漂移，劫後餘生的掙扎和悲苦。或許這樣的作品裡無一字反抗，無一語抱怨，只要平鋪直述，就會讓當權者動氣傷神。在反共文學當道的時代，王默人或許只是選擇誠實面對現實世界，選擇誠實說話，便不自覺地站在當代主流文學的對立面了。作家去刻畫苦難、困境中不屈的生命，描寫他們向命運搏鬥的不屈不撓，給苦難中的生命溫暖，為受苦的人祝福，也不過是守住文學中最基本、不可退讓的人道精神的底線而已。

何況，王默人隨軍來台時，還只是13歲的少年。他的小說〈劫後餘生〉都是他的親身經





景或是衰頹，礦工礦民的日子都是暗無天日的。70年代鄉土文學爭論的年代，也出現過為礦工說話的小說，但王默人的礦工生活描述，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是，他無意傳達礦山或礦工悲曲，他以相當特別的角度，傳達的是礦山人的生活和生命理念。礦山人是王默人文學單行道上非偶然的一群人。

王默人在被迫離開台灣25年後，接受李勝吉訪問時說，他的寫作幾乎完全斷裂，他說：「我自寫小說開始，我就不知不覺，也是自然而然的成為我寫作最基本的信念，也可以說我寫作的源頭。那就是我寫的內涵與我生活的土地和廣大的同胞人民血脈融合在一起了，無法分開。可能是我寫作的要素，與很多寫小說的人大不相同。所以他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繼續寫作，我就不能做到這點。」他對自己形同被放逐到美國，經過了25年之後，依然憤憤不平，因為他等於被迫放棄寫作。不過，他這段受訪的答話，等於解開了埋藏心中二十多年的謎疑——何以王默人的文學能在他相同背景的作家中獨出「異質」？原來就是他早把異鄉當家鄉，他早早解決了他的心靈歸屬問題。氣憤之餘，他也不忘小小嘲諷了他人一番。不過，他發言的主旨是嚴肅的，他表達了他與眾不同的基本文學觀。他補充說，他是不忍心繼續讓自己的異質性，為妻兒承受辛酸、災難，不得不遠走他鄉，而導致「割斷了我與故土連繫的

根」，斷了寫作的源頭。

看到王默人這一段話，令我想起葉老的名言「沒有土地，哪有文學？」王默人就是不願隨俗附眾以夢鄉為家鄉，而與他的時代環境格格不入，終遭排擠放逐。1980年代，葉老說這段話時，有人認為他是意識型態掛帥。其實從王默人的土地認同經驗看來，土地其實是中性的，也可以說是無色彩的。有了土地歸屬的作家就有源源不絕的創作之泉。索忍尼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因堅持前往瑞典領獎而遭蘇聯政府放逐，他的文學也就逐漸走入尾聲。俄國這塊土地，絕不是索忍尼辛的夢土，而是充滿荊棘、痛苦記憶的大地，然而失去它也就失去了文學。我也相信葉老在擁抱台灣大地時，也是清楚地知道，他必須同時擁抱這塊大地上的一切，包括歷史累積的滄桑、苦難，沒有這些或刻意割捨這些，擁抱的就不是台灣文學了。

王默人似乎把土地和他的文學關係更形簡化了，也許他當時面臨的是比葉老更複雜的土地認同難題，他撇開歷史、政治，甚至文化因素的就地歸化，不僅可以不必陷入那錯綜複雜的思考面向，快速地走出認同的困惑。嚴格說來，他的文學為他同背景作家立下了典範。只可惜，不但沒人理會，還成為被驅趕的異類，也正因為他的異類，帶給我發現的驚喜。 